

海外华人研究

华人经济的崛起

储玉坤

一、引言

华人经济的崛起，不仅成为促进亚太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引起国外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专家的关注。近几年来，国内外报章杂志对华人经济的崛起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各种意见和构想。由于出发点不同，对华人经济的概念大相径庭。有人把它纳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范畴，称它为“大中国经济圈”或“大中华经济圈”，甚至还有人称它为“华人经济共同体”。其他称谓，更是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所以，在就华人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之前，首先要表明——各自对华人经济的含义及其形态的看法。只有在概念相同的前提下进行辩论，才能集思广益，取得共识。故本文有必要在引言中说明作者对华人经济所持的基本观点。简言之，华人经济是在中国大陆同港澳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大量引进海外华人的资金和技术而形成的一种经济组合。论其性质与形态不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的区域经济集团，既不同于欧共体建立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也不像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言以蔽之，华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

的经济现象。这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提出来向与会的学者专家讨教。

二、华人经济形成的国际背景

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长期陷于“滞胀”的困境。因此发生大动荡、大分化，急需重行组合，出现了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经过几年进程，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就初步定型，三个地区经济集团的轮廓一目了然。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这三个地区经济集团的情况简介如下：

（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洲一体化虽因欧共体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问题严重放慢了进程，但仍执着地沿着深化和扩大的轨道前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又名《欧洲联盟条约》）于1992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之后，欧洲统一大市场终于在1993年1月1日正式启动，开始运转。一年多来的情况，从总体看来，可以肯定运转正常，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期间，欧共体各国已使用统一的产品证明和经营许可证，使多国企业均能自由进入这个统一大市场；同时各国的金融机构也能在12国自由经营。因此实现了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对提高各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机会，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尚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是它的效果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诚如欧共体的有些领导人所说：“如果没有这个统一大市场，欧共体的经济和就业情况可能更糟。”所以，欧洲统一大市场对其他国家仍有吸引力，欧共体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谈判达成的《欧洲经济区条约》，几经波折，终于在1994年1月1日起生效。这样，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口3.72亿，面积372.5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6.9万亿美元以及人均出口额3878美元），也就宣告成立，对整个世界经济将产生重大的深远

影响。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诞生——1993年11月24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议会分别完成了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批准手续之后，北美自由贸易区便在1994年1月1日宣告成立。按照协定的规定，美、加、墨三国从协定生效之日起，在今后的15年内，逐步取消相互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从而形成一个拥有3.64亿人口和6.4万亿美元产值的大贸易集团。这样广阔的自由市场，势将增强三国的生产能力，提高同其他地区的经济集团进行有效竞争的能力，从而使整个北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前进的步伐。不仅如此，还会对今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亚太地区经济集团化尚在发展中——亚太地区经济集团尚未形成，还在发展之中。目前关于亚太地区经济集团的构想甚多，但要将构想变为现实，还有一定的困难。首先是日本提出的“东亚经济圈”，主张由日本、亚洲“四小”以及东盟国家等10个国家（地区）组成，通过10国（地区）在贸易、投资和货币上“三位一体”的合作，由日本带领，组成一个经济集团，借以加强经济实力，同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相抗衡。日本提出这个构想不仅以“雁头”自居，而且还把美国和中国排除在集团之外，因此未能得到亚太国家（地区）的欢迎。其次是1989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提出的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会议的倡议。因为得到这一地区各国的同意，就在该年11月举行第一届部长会议，但未谋求在亚太地区建立贸易集团；1991年11月间举行第三届部长会议时，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也参加了会议，使成员总数增加到15个。会议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汉城宣言》，明确规定了该会议的宗旨、活动范围和合作方式。1993年7月初克林顿总统在东京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倡议；并为了强化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的机能，建议该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一

次非正式的亚太首脑会议。如将参加亚太经合会议 15 个国家和地区合在一起计算，人口 20 亿，产值占全世界产值的一半，贸易额也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0%，综合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欧洲统一市场。此外，1991 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组织“东亚经济圈”的设想。由于这个设想将美国排除在“东亚经济圈”外，使它在东盟 6 国内部也未能取得一致共识，直到目前，还不具备由构想变为现实的条件。

由上所述，可知世界经济贸易的地区化、集团化是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华人经济正是在这种国际经济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时代的特征，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给它命名为“华人经济区”^①。这种称谓是否恰当有待商榷，但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三、促进华人经济崛起的动力

促成华人经济崛起的因素很多，但是主要的有下列几个：

（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推动华人经济崛起的主旋律。自 1979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遗余力地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姑以国民经济而论，10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年均增长率为 10%，1992 年和 1993 年加速增长，分别高达 12.8% 和 13.4%，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使得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足以充当亚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火车头。与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大大增强对外国资本家的吸引力，特别对港台企业家和海外华人资本家更加富有魅力，使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1992 年外商直接投资为

据世界银行于 1993 年 4 月 18 日发表的《1993 年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

11.3亿美元，1993年新签协议金额为12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7%；实际使用外资36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1.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25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3倍^①。最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投资占有极大的比重，几乎高达80%以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外贸易也蒸蒸日上，1992年进出口总额增达16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居世界排名第11位；1993年进出口总额又增加到19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②。如能按照目前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1世纪初期，中国将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自不待言。

（二）大陆与台湾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两岸的经济合作——近年来，由于大陆和台湾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使得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早已进入交流合作的阶段，而且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表现在台商投资大陆和两岸贸易往来频繁这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1. 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经久不衰——回顾往事，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首次出现在1988~1989年间。当时台湾的投资环境恶化，不仅地价狂涨，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水电供应也成问题，导致传统加工型的产业无法生存，不得不向外迁移。因此台商纷纷将原有的设备搬到大陆设厂生产。尽管这些赴大陆设厂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但是尝试的结果显示出两岸在经济上的互补优势。因此，向大陆投资就成为台湾企业家的普遍愿望，由此再次掀起台商大陆投资的热潮。1990年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激增，达11032项，协议资金总额为8.9亿美元，成为该年大陆的第二大投资者。1991年台商大陆投资更上一层楼，投资项目的协议金额合计为1²亿美元，比上年激增35%。最近几年来，增长的势头有增无减，特别是1993年尤为强劲。据香港台北贸易中心有关人士预计。到

①②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94年2月28日发表的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1994年3月1日。

1993年12月底为止，累计投资金额可望突破100亿美元。但这个估计还不是确切的数字。有人说近年来台湾民间的汇款和数以百万计的回大陆探亲或观光所支付的费用，合在一起计算至少有50亿美元。最近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到1993年6月为止，台商大陆协议的投资金额已达142亿美元^①。尽管这个数字也未必准确。但是由此可以预见到；今后台湾厂商大陆投资将朝着大型化、集团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2. 两岸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海峡两岸通过香港进行贸易往来，从零开始，也已取得迅猛的发展。1993年两岸之间双向贸易额增达143.9亿美元，台湾一跃而为大陆的第四贸易伙伴^②。如同1979年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主要原因是由于两岸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加以台湾为了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得不采取全方位的出口政策，而增加对大陆市场的出口，这正是台湾销售产品的最佳出路。前任“行政院长”郝柏村在任职期间一直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把大陆资源视为台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③。所以这几年来的两岸贸易往来突飞猛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991年两岸贸易额为55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了58%，1992年为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1993年为143.9亿美元，又增长了100%。展望1994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将超过美国，可望增达240亿美元，使大陆有可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三）香港同内地在经济上唇齿相依——由于地理地位和自然环境的特殊，今日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贸易转口的中继站。它同内地的关系好比是互相依靠的唇和齿。一方面香

① [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2月9日。

② [香港]《明报》1994年1月17日。

③ [香港]《亚洲周刊》1992年1月12日。

④ [台湾]《联合报》1994年1月15日。

港是内地进入世界的通道，又是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诚如美国基金会管理人员丹尼尔·弗兰克访问香港和中国之后深有体会地说：“10亿人正在加入资本主义体系，其通道便是香港。”另一方面，大陆对香港也是至关重要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香港之所以有今日如此繁荣，之所以能有更具发展潜力的希望，正是因为有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接着他又说：“在经济上，香港与大陆已越来越紧密。香港的资金、人才、资讯对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固有很大的催化作用；而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不宁唯是，而且香港在海峡两岸中还会起桥梁作用。两岸的贸易往来既要经过香港转口，台商大陆投资也要依靠香港的中介作用。所以，香港同内地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论在投资或者在贸易方面，近年来都已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1. 在投资方面——离开香港回归中国虽然还有几年时间，但在经济上早已同中国实现了一体化。据日本记者报道，目前出现了“香港中国化”将促进“中国香港化”的现象^③。表现在投资方面尤为突出。香港投资中国内地已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80年代初的金融贸易，第二次浪潮是港商在中国经营低成本加工制造业，现在是港商正在对内地掀起的第三次投资浪潮。不论其性质和规模都同以前的两次不同。姑以投资地区而论，已由珠江三角洲地区向北方的上海、天津扩张，以至深入全国各地。在投资领域方面，也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如技术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等。在投资者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多为中小企业，而今却是大中投资者、大财团以及跨国公司。在投资金额方面，香港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连年保持独

〔美国〕《福布斯》双月刊，1992年7月6日。

〔台湾〕《中国时报》1992年1月6日。

③ 据《日本经济新闻》1993年6月28日发表题为《香港同中国实现一体化》的报道

占鳌头的地位。1992年底，香港在内地投资总额累计为 300 亿美元，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总额 520 亿美元的 58%。其中有 120 亿美元集中在广东一省，使该省成为港商的后方生产基地。这样就把香港同内地各自拥有的优势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两地合作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在港的中资企业也很活跃，大量购买香港企业和不动产。据香港恒生银行的研究报告，至 1993 年 6 月底，中国对香港的投资总额累计达 180~200 亿美元，取代美国（85 亿美元）和日本（115 亿美元），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

2. 在贸易往来方面——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同香港的贸易往来突飞猛进，双向贸易额从 1979 年的 171 亿港元激增到 1989 年的 343.4 亿港元，10 年内增长了一倍以上。以后双方的贸易蒸蒸日上。1992 年港对内地出口额为 1416 亿港元，比上年增长了 24%；从内地进口额为 2540 亿港元，比上年增长了 29%，使两地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外汇收入约有 33% 来自香港。1993 年两地贸易更上一层楼，双向贸易额增达 325.4 亿美元。在中国 10 大贸易伙伴中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日本的 390 亿美元。最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贸易主要是转口贸易，1993 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 8230 亿港元，其中有 7270 亿港元是转口中国的，占其转口总额的 88%。中国的出口几乎有一半以上是通过香港转口的，中国从香港转口输入内地的货值也占中国全部进口的 25%^①。

与此同时，香港同台湾的经贸关系也日臻密切，互相依存不断加深。1993 年台湾对港出口额为 184.5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19.7%，依存率增达 21.7%；台湾对港贸易顺差高达 167.2 亿美元，如果没有这笔巨额顺差，那么台湾就会出现 88.5 亿美元的逆差。据台湾“经济部统计处”预测，1994 年台对港出口将增长

① 《深圳特区报》1994 年 1 月 24 日。

30%，达240亿美元。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香港就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进口台湾商品最多的地区。这是由于台湾同大陆经由香港进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所造成的。

四、海外华人的资本与技术

海外华人的资本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资本跟海外华人的技术是华人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所创造的。”国外报刊也特别重视海外华人资本与技术对华人经济的崛起所产生的作用。例如美国《新闻周刊》曾在文中写道：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散布全球各地的5000万海外华人。”该刊还作出粗略的估计，“中国目前吸引外资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②这个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个80%应该加以分析。姑以1992年为例，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共计113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的占68.3%，来自台湾的占9.3%，来自澳门的占1.8%，来自新加坡的也占1.1%，合在一起计算为80.5%。^③这不免估计过高，但日本企划厅也持相似的观点，它在一份白皮书中写道：除了大陆、香港、台湾在民族、语言、文化上相同没有任何障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人数总计5500万海外华人的资本，它已成为中国从国外引进大量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来源。^④

海外华人散布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大约有5500万人。华人素以富于创业精神和刻苦勤劳见称于世，在当地工商界

① [新加坡]《联合晚报》1992年9月29日。

② [美国]《新闻周刊》1993年4月12日。

③ [英国]《经济学家》1994年4月16日。

④ [日本]《读卖新闻》1992年12月16日。

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工商界处于重要地位。由于缺乏统计资料，全球华人财产究有多少，还是一个问号。但据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的估计，5500万海外华人拥有流动资产2万亿美元，生产总值至少有5000亿美元^①。其中大部分是在东南亚各国，而技术力量则主要在北美。现将其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一）东南亚华人资本——移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占海外华人总额的80%以上，大半在当地从事工商业，对于所在国经济的发展有过极大的贡献；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华人资本也日益壮大，表现在华资金融业方面尤为突出。据美国《投资家》杂志于1983年6月公布的全球12位拥有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大银行家，其中就有5位是东南亚华人资本家。他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兴隆集团的郭芳枫和郭令烂兄弟、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李成义、印度尼西亚亚细亚银行集团的首脑林绍良以及泰国曼谷银行创始人陈弼臣。^②至于华人资本经营各行各业的方式，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由独资企业、家族企业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以及跨国公司。最近又出现了集团化的趋势，联结成了许多华资集团，对外投资占海外华人投资总额的70%强。过去投资集中在东南亚，现已扩大到北美、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由于华人企业家、资本家看好中国投资环境，认为正是到中国去投资的时候了。但是他们投资中国却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甚至有些公司或财团先到香港设立公司或分支机构，然后再到大陆投资。这样一来，东南亚华人资本和港资混在一起，在统计上无法区别。加以缺乏调查统计，无数数字可依。因此东南亚华人资本家在中国投资情况，只能从略了。

（二）在美华人的技术——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定居美国境内的华侨和华裔美人约计164.6万人，再加上最近从东南亚和

〔韩国〕《经济学人》杂志1993年12月5日。

蔡北华主编：《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韩国去美国定居的华裔新移民，共有 200 多万人。他们分散在美国各州和各大城市，从事各种行业，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曾产生积极作用，受到历届总统的肯定和表扬。特别在科学技术界，华人科学家人才辈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金的，就有四位之多。他们是丁肇中、李政道、李远哲以及杨振宁等。他们身在美国，且已取得美国籍，成为美籍华裔科学家，但是他们依旧怀念祖国，关心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来华讲学，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供宝贵意见。由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要点，一是利用外资，另是引进先进技术。所以在美华人科学家将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对中国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海外华人投资中国。

又据统计，在美国的华人企业大约有 700 多家，大半是中小企业。但也有初具规模的大公司。它们在中国拓展市场，不但设立分支机构或创办合资企业，而且还把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现举二、三事例如下：

1. 王安博士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它是由一家小小的实验室发展起来的，专门生产和推销办公用的电脑，全盛时期一年的销售额曾创下 26.4 亿美元的最高纪录，使王安博士成为举世闻名的“电脑大王”，拥有 20 多亿美元的财产，跻身美国富豪的行列。他多次来华探亲，把一架最新式的王安电脑赠送给上海交通大学，以更新该校的科研设备。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王安电脑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中国大量销售电脑，并传播电脑技术，对中国发展电脑事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 联合国际电脑公司。它是在华人科学家、企业家王嘉廉的苦心经营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看好中国电脑市场，将其生产的电脑在中国销售，同时也将最新的电脑技术引进中国。

3. AST 研究公司。它是几个华人企业家与人联手创办的，以生产电脑软件为主。看到中国对电脑软件的需要，把销售的重

点放在中国市场，每年销售 4 万台，占中国电脑市场的 20%。最近该公司计划在天津与中国联想集团创办合资企业，专门制作办公用的电脑软件。

此外，还有一个美国百人会，是由各个领域内卓有成就的美籍华人组成的。1994 年 3 月该会组成代表团来华访问，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五、结 束 语

综上所述，华人经济的崛起，是由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造成的。由于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华人资本家、企业家纷纷投资中国大陆，并给中国大陆引进先进技术，对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华人经济早已与其所在国经济相融合，成为该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华人投资中国大陆，理所当然地可以视为中国大陆与其所在国进行的经贸合作。在中国方面，因为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故能从华人投资中得到好处；而在华人所在国方面，因其需要国外市场，也能从华人投资中国获取利润。双方既能找到互惠互利的基础，对华人经济的崛起及其茁壮成长，也就会采取支持和爱护的态度，促使华人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作者认为华人经济的发展对所在国、中国以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是有利的，它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1994 年 4 月底完稿

（储玉坤，1912 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

东南亚华人财团浅说

丁 日 初

本文为提交上海中山学社1994年5月举办的“孙中山与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同年10月作了改写，题目亦加变动。——作者

散居海外的华人甚多，其人数迄今尚无精确的统计。据《海外华人经济年鉴》统计，海外华人总数约2950万人，其中除文莱以外的东盟五国的华人约2130万人，占72%强。对他们拥有的资金，各方专家的估计悬殊，有待进一步核实，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各地华人资本总数中居压倒地位。投资中国的华人资本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尤其是华人财团。因此，我们研究海外华人经济，应当着重研究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资本、特别是资力雄厚的华人财团。东南亚华人财团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本文只就以下三个问题将平时阅过的材料加以整理，并略抒管见，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关心。文中疏漏之处，请专家指教。

一、华人财团的发展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东南亚华人财团的发展既同华人的主观条件有关，又决定于

转引自“海外华人——一往无前的力量”，原载1992年7月18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汉译文见《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此处数字是根据该辑第109页上的一个表计算的。

居住国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华人移民为数甚多，他们勤劳奋斗，善于经商，有为穷困亲戚同乡赚钱创业的传统。凭着这些优秀的主观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华人移民就在东南亚各国创立了以商业为主的小型居多的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先后独立，于是华人资本开始走上发展的新阶段。但所在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这一客观条件不同，它们对华人资本的成长所起的作用也各异。考察这一时期华人资本、华人财团发展之迅速与规模之大小，都必须同它所处的政治条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居住国的政治独立，是该国华人资本有可能发展的一个条件，重要的是要看独立后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华人资本的成长。下面，举几个国家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印尼共和国自 1945 年 8 月宣布独立至 1966 年苏加诺总统下台止的 20 年间，历届政府对华人经济采取限制和排挤的政策，因而后者得不到发展，绝大部分停滞于中小企业的规模上。印尼全国的经济建设虽比过去有些进步，但成绩甚小，年人均收入只有 70 美元。1967 年苏哈托总统上台执政后，总结过去的教训，提出新的方针与政策。他宣布“应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优先地位”。同年颁布了《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1968 年又颁布了《印尼国内资本投资法令》。苏哈托“向全体人民呼吁，必须提高警惕，不要陷入种族主义泥坑里去。……华裔印尼公民，尽管他们有中国血统，但他们毕竟是印尼公民。他们和土著印尼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对于华人资本，他说：“为了进行经济建设，我们给他们〔华人〕提供同等的机会。……我们应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苏哈托的新政策，为印尼华人资本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政治保证，成为推动后者

参见蔡仁龙《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与前景》（以下简称《印尼华人企业集团》），“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第 1~2 页。

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

菲律宾共和国华人资本的处境，同样也经过由坏转好的过程。该国自 1946 年 7 月宣布独立至 70 年代中期，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挤华人企事业的所谓“菲化”法案。它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的。战后一段长时期中，世界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况，中国成了冷战的对象，一些敌视中国的国家，对外反华与对内排华同时进行。同时，华侨在菲律宾经济中拥有相当力量，一些政府官员乃至平民曾错误地认为，为了谋求经济独立，必须实行菲化政策，狠抓打击华人经济。由于零售商业菲化法案的实施，长期主要在商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华侨商人几陷绝境，必须另找出路。而菲政府为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从 1950 年起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实施一系列鼓励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给菲律宾华侨带来了从商业领域转向工业领域发展的机遇。从 7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菲政府并接受上一时期实行“菲化”的各种教训，其华侨政策改为较宽容的“加快同化、放宽入籍、利用为主”。1975 年和 1976 年马科斯总统连续发布了总统令，宣布简化华侨归化手续，使约占 90% 以上的华侨陆续取得菲律宾国籍，享有土著菲律宾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从此菲律宾华人资本进入大发展期；多数创业于五六十年代的华人财团，开始获得较大的发展。^①

马来西亚联邦的前身“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于 1957 年 8 月，比印尼和菲律宾迟十二二年，但独立后的政府立刻实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1957~1970 年间，马政府在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的基础上，推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刺激国内各族私人资本的投

参见蒋细定《菲律宾华人财团发展的背景、特点与前景》（以下简称《菲律宾华人财团》），“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3页。

资，从而使民族经济得到较快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财团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1957~1970年间产生的华人财团，经济实力尚弱。据官方公布资料，直至1970年，在西马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计投资额53.3亿马元中，外资占63.3%，华资只占27.2%，由此可得到旁证。1970年拉扎克继任总理后，提出治理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其基本点是：（1）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使经济支配权从外资手中转到本国资本手中；（3）相对缩小贫困阶层。自80年代以来，华人资本正是利用了国家政策放宽私人企业投资的机会，同政府的经济开发政策密切结合，使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企业集团的经济实力获得新的扩展，而且涌现了一批新的华人企业集团。马来西亚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东南亚各国华人财团的兴起与发展，国家的政策引导和政府采取措施给予帮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如上所述，华人财团之是否发展系受所在国政府政策的制约，而它们如何发展，即其经营方向所带来的资本结构，则受该国经济结构的制约。新加坡的例子最为明显。如一位研究者指出：“新加坡的经济结构是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外国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新加坡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出口倚重于外国投资企业，金融业部门的外资银行其资产、存放款额和净收益额均超过当地银行。而国内基础设施部门由国家资本所垄断，交通运输（如航空、海运）、通讯以及城市公用事业主要由国营企业来经营。因此，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的投资和经营领域相对集中于非制造业部门。在世界华人富豪榜上，新加坡的华人富商无一不是金融巨子、地产巨子、百货业大王^{②③}。

参见林伍琬《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与特点》（以下简称《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3页、6页。

原注：“1992世界华人富豪特辑”，载香港《Forbes》第4期。

王勤：《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及其海外投资》（以下简称《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3页。

二、华人资本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们已经知道，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资本如果按照政府的政策，入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适应该国经济结构的要求，在政府的引导或帮助之下进行经营，那么它们是会得到顺利发展的。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华人资本发展的基本趋势怎样，换句话说，它们的发展经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认为，华人资本本身的一些条件，例如资本少、善于经商等都是差不多的，而所在国都原属外国殖民地，独立不久，经济落后，亟需有步骤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而华人资本的发展都经过了由小到大，由商到工，由单一经营到多元经营，由少数企业到企业集团，以至少数大企业集团经过海外投资发展成为跨国集团。这是它们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这种发展不是唯一的模式，由于某些原因，有的华人资本一开始就规模较大，或者由商业经营向金融业经营发展，这是基本趋势中的另一种模式。

华人在东南亚经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期一批批海上贸易商人在侨居国定居下来成为当地城市的商业资本家^①。还有大量华工定居下来后转业为零售商或小商人，有些人通过帮助外国大商行的购销活动挣得了中间商的地位^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商业在东南亚华人经济体系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如泰国是70%，马来西亚是50%，越南是56%。”^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华人商业继续维持或发展。一批新一代的华人利用原有的商

① [日] 游仲勋著、郭梁等译：《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② 汪慕恒：“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经济。”见南洋研究所编《南洋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③ 郭伟锋著《当代港台南洋经济强人列传·代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香港亚洲出版社联合出版，第281页。